

大陸市場轉型期長三角府際 關係：競合取向

陳德昇*

摘要

近二十餘年來，長江下游之上海、江蘇與浙江，以有限之幅員與資源，造就中國大陸最具競爭優勢與生產力之區域。儘管長三角地區經濟表現亮麗，但其政府間之運作機制、協調與分工，以及矛盾與挑戰，仍將攸關長三角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景，值得賦予更大之關注。本文嘗試以府際關係與「競合」(co-opetition)觀點解讀市場經濟轉型中區域政府角色與行為，觀察政府間利益矛盾與整合進程和挑戰。

中共新領導階層「上海幫」色彩已淡出，中央新政治菁英胡錦濤與溫家寶傾向於平衡的經濟發展策略。因此中共現階段區域發展策略調整後，上海扮演長三角的龍頭角色便會受到挑戰；蘇、浙、滬三省市之間之「競合」態勢亦將產生變化。上海如何在此現實背景下，維繫其領航角色，促成「競合」態勢良性發展仍有頗大努力空間。

上海與浙江無論是在歷史淵源、人脈互動，或是實質合作皆有明確之作為與意願。反之，上海與江蘇之競爭張力則較大。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上海與浙江政府間良性競合關係將較早浮現，這顯然與兩省間「競合」能產生與外溢更明確之經濟利益有關。長三角省級政府間要在短期內消除惡性競爭，以及低水平的重複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大陸社會經濟所所長。

建設並不現實。關鍵仍在於：建立公平競爭與市場遊戲規則，以及必要的中央層級協作機制運作。

關鍵字：長三角、競合、府際關係、經濟轉型

壹、前言

近二十餘年來，在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長江下游之上海、江蘇與浙江（參見圖一）區域經濟快速發展，並以有限之幅員與資源（面積佔全大陸 2.2%，人口佔全大陸 10.3%），造就中國大陸最具競爭優勢與生產力之區域。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 年中



圖一：長三角「兩省一市」地理區位

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綜合排名顯示，上海、浙江、江蘇分別名列第一、第五、第六（張帆，2003）。2003年滬蘇浙 GDP 總量已達 28106 億元（人民幣，下同），佔全大陸 GDP 總量 23.97%；經濟亦呈現持續高成長之勢（參見表一、二、三），顯示其經濟發展實力與潛能。

表一：長三角地區範圍與經濟指標（2003 年）

地區	土地面積 (萬平方公里)	年底總人口 (萬人)	GDP (億元)	人均 GDP (元,人民幣)
全國	960	129227	117251.9	9101
上海市	0.6	1341.77	6250.81	46718
江蘇省	10.3	7405.82	12460	16824
浙江省	10.2	4551.58	9395	20147
長三角	21.1	13299.17	28106	27896
佔全國 (%)	2.20	10.3	23.97	3.07 倍

資料來源：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9月，頁4、24、53。
2. 《上海年鑑》，2004，上海：上海經濟年鑑社，2004年5月，頁582-583。
3. 江蘇省統計局，2004，《江蘇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6月，頁42。
4. 浙江省統計局，2004，《浙江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7月，頁12。

表二：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增長率（1978-2003年）

時期	單位：%				
	長三角	上海	江蘇	浙江	全大陸
1978-1991	8.40	7.43	10.82	12.15	9.04
1992-2001	13.15	12.48	14.25	14.21	9.77
1978-2001	10.44	9.60	12.30	13.04	9.35
1992	21.0	14.8	25.6	19.0	14.2
1993	19.3	14.9	19.8	22.0	13.5
1994	17.1	14.3	16.5	20.0	12.6
1995	15.5	14.1	15.4	16.7	10.5
1996	12.5	13.0	12.2	12.7	9.6
1997	11.9	12.7	12.0	11.1	8.8
1998	10.5	10.1	11.0	10.1	7.8
1999	10.1	10.2	10.1	10.0	7.1
2000	10.8	10.8	10.6	11.0	8.0
2001	10.2	10.2	10.2	10.2	7.5
2002	11.2	10.9	11.6	12.5	8.3
2003	14.1	11.8	13.5	17.0	9.3

資料來源：同表一，資料來源 1，頁 55；資料來源 2，3，4。

表三：長三角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佔全大陸的比重（1978-2003年）

年別	全國 GDP (億元)	長三角 GDP (億元人民幣)				佔全大陸的 比重 (%)
		上海	江蘇	浙江	合計	
1978	3624.1	272.81	249.24	123.72	645.77	17.82
1980	4517.8	311.89	319.80	179.68	811.37	17.99
1985	8964.4	466.75	651.81	427.50	1546.06	17.25
1990	18547.9	756.45	1416.50	897.99	3070.94	16.56
1995	58478.1	2462.57	5155.25	3524.79	11142.61	19.10
2000	89403.6	4551.15	8527.3	6036.3	19170.22	21.44
2002	104790.1	5408.76	10631.75	7796	23836.51	22.75
2003	117251.9	6250.81	12460	9395	28106	23.97

資料來源：同表二資料來源。

儘管長三角地區九〇年代以來經濟表現亮麗，但其政府間之運作機制、協調與分工，以及矛盾與挑戰，仍將攸關長三角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景，值得賦予更大之關注。本文試以府際關係與「競合」(co-opetition)觀點，解讀市場經濟轉型中區域政府角色與行爲，觀察政府間利益矛盾與整合進程和挑戰。此外，本研究亦關注下列焦點議題（一）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省級政府存在非完全單一面向之「競爭」或「合作」關係，而存在動態變遷之「競合」過程；（二）區域經濟整合與府際合作是以現實經濟利益分享與實惠爲前提要件；（三）中共新政治菁英甄補與區域發展策略之調整，牽動長三角競合態勢與府際關係變遷。

貳、文獻探討

有關長三角府際關係與競合觀點之文獻主要包括：劉石慧與王正衛教授（2003）以城市化的觀點，解析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五大趨勢。其中包括：（一）就國內外環境分析，長三角城市將朝「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路徑發展；（二）加入 WTO 後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的產業整合將進一步推進；（三）依循城市發展學說和位次規模法則，長三角地區城市化將加速推行；（四）基

礎設施強化將重塑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城市經濟關係。(五)上海核心城市功能強化，帶動城市群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尤其是隨著上海城市輻射功能的加強，位處江蘇省的南京與浙江省的杭州亦將受其影響。透過上海吸引能力與輻射功能促成長三角各城市一體化聯動發展，發揮國際競爭優勢。

朱文暉(2003)在「走向競合一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比較」論著中，以競合觀點分析指出：(一)地方政府在推動長三角產業集聚與地區集聚時，也受到同一區域內其他地方政府行爲的影響，彼此之間出現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二)長三角三地方政府間相互學習與競爭，並不停吸取對方之長處，以彌補自己之短處；(三)八〇年代由於上海無法帶動江蘇與浙江經濟發展，因而三地的整合更多體現爲矛盾與競爭關係；(四)九〇年代中期以後與二十一世紀初，則由於上海經濟起飛產生之輻射作用，而促成長三角競合趨勢成爲可能。

石憶邵、王克強(2002)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協調發展的特徵及問題探討」文中指出：(一)在長江三角洲必須重視構建區域整合發展機制。(二)利益分配問題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重複建設和地方保護主義頑疾久治不癒的根源所在。地方保護實質上是地方利益保護。(三)區域利益的協調是一個複雜而棘

手的問題，需要採取綜合性措施來進行調節。(四) 區域分工政策是區域政策的基礎和核心，區域佈局政策和特殊問題區域政策是區域分工政策的深化和具體化，區域管理和調控政策則是其他政策順利實施的保障。(五) 區域協調發展的障礙，往往產生於不同行政區域的政策和制度之間的相互衝突和矛盾。

卓勇良、孫裕增(2003)在「切實構築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機制—長江三角洲地區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態勢研究」文中分析江浙滬合作機制，主要論點包括：(一) 區域經濟關係的變化，導致浙江對於浙滬合作的需求發生巨大變化。由實物性的傳統經濟需求為主，轉為更高層次的新經濟需求。(二) 通過加強江浙滬三地的合作，形成政策協調、規劃銜接、競爭有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必須齊心努力才能奏效。(三) 競爭有助於提高政府治理水準。(四) 江浙滬三地互為一體，共同參與磨合和全球市場競爭中居於更有利的地位。(五) 隨著政府職能和運行機制的進一步轉變，區域政府在使用有限的政策工具的同時，應該著力消除市場壁壘，打破部門壟斷，規範市場秩序。(六) 提高基礎設施的整體性，是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內的內在要求，是政府職能的體現。

透過上述文獻檢視，多偏向於區域競爭、城市競爭、利益分派、城市化與競合觀點，論述長三角區域與城市發展。有關長江

三角洲省級政府之研究，尙未有以府際關係與競合觀點進行分析。此外，中央與地方政治菁英之角色與作為，亦攸關府際與競合關係之運作和變遷，值得深入探討與解讀。

參、理論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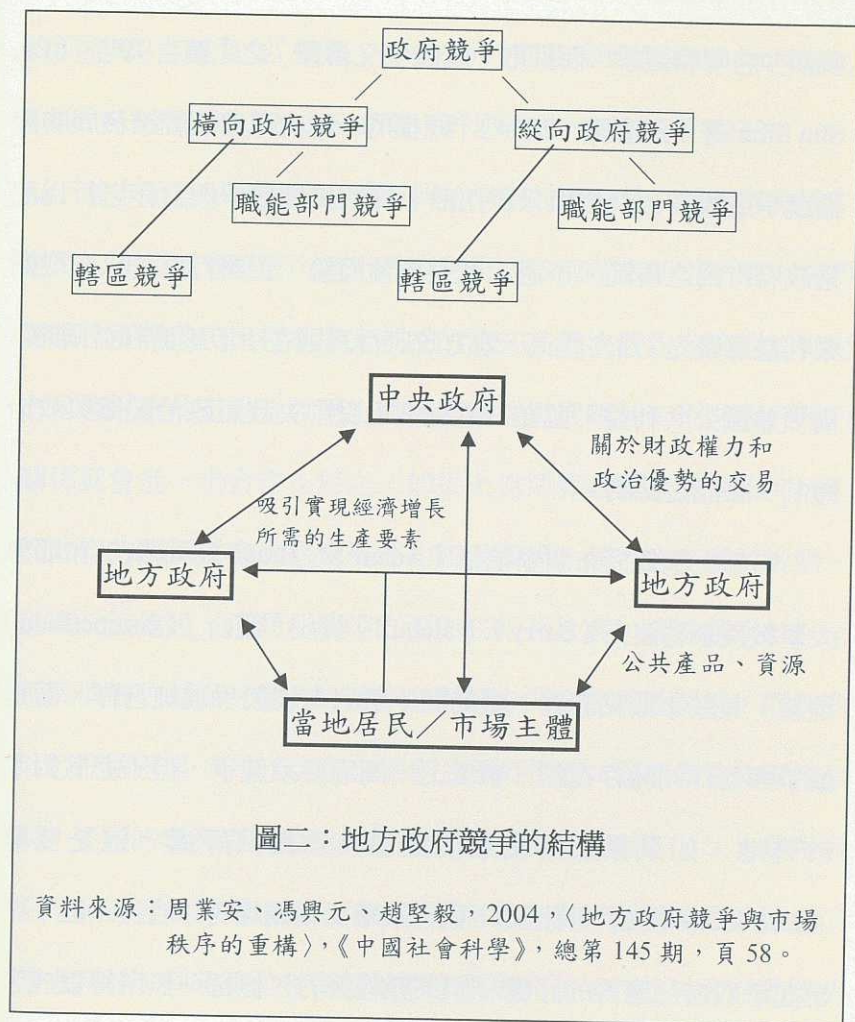
府際關係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政府間的相互運作關係。狹義來說，主要係指各層級政府間之垂直互動關係。不過，就廣義而言，府際關係其實更涵蓋同級政府間的水平互動關係、特定政府機關內各部門間之協調管理，及政府機關對外與民間社會的公共關係等。一般而言，府際關係的相關概念，除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外，另又包括聯邦主義、廣域行政、府際管理、跨域管理等。事實上，府際關係就是政府之間的關係。它是指政府之間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縱橫交錯的關係，以及不同地區政府之間的關係。它所關注的是管理幅度、管理權力、管理收益問題。因此，府際關係實際上是政府之間的權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關係（謝慶奎，2000）。

由於橫向地方政府經濟協作具有經濟功能與價值，因而興起以地方政府協作之區域經濟開發與合作。對於具有自治權的地方

政府而言，此種區域經濟開發與合作的開展是自主安排進行，但在中央集權國家中央政府仍有相當影響力，不過地方政府也發揮重要推動作用。此外，橫向府際關係的發展亦會直接影響到縱向府際關係的發展。因為隨著橫向府際關係的發展，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能量與實力增強，這便使地方政府產生要求改善縱向府際關係的政治訴求與行政衝動，其目標是擴大地方自主權、提高地方政府地位。此一趨勢在單一制集權國家表現尤為明顯。

處於市場轉型階段，府際關係基本上屬於「競爭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¹，其運作不僅體現在地方政府之間，亦反映在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此外，此種競爭亦在同級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門相互間展開橫向競爭，且在上下層級間展開縱向競爭。基本而言，競爭的本質目標都是為了吸引和實現所轄區域經濟增長所需的生產要素。不過，在縱向競爭中則突出表現為財政移轉支付、財權的分割，以及政治權力的配置等交易。而競爭壓力來源主要來自：地方領導政績表現、有限資源的爭奪，以及市場現實需求（參見圖二）。

¹ 「競爭性政府」概念引自 Albert Breton 1996. *Competitive Government: An Economic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企業行爲與市場轉型後中國地方政府行爲有頗多共通性。例如，企業追求商業利潤，採取價格與優惠策略，以尋求利益最大化，顯然與當前中國地方政府圖謀振興產業，採行殺價競爭、提供優惠以吸引外資之行爲取向相通。此外，在全球化潮流下，企

業競爭日益激烈，並面臨微利化挑戰，因而企業間多揚棄「你死我活」之零和競爭，而採取「既競爭又合作」之「競合策略」(Lu, Shu Shin 著，孫彥譯，2004)。同樣的，地方政府間經濟發展的惡性競爭造成資源耗損與分派扭曲，採取良性競爭與合作之行為應是政府行為之規範。不過，就差異性而論，企業行為是以牟取商業利益為優先，自主性高，地方政府行為則在爭取經濟利益同時，尚須兼顧公共利益，並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央政府政治紀律與政治體制、職能之節制。

哈佛大學教授布蘭登柏格 (Adam M. Brandenburger) 和耶魯大學教授奈勒波夫 (Barry J. Nalebuff) 提出「競合」(co-opetition) 理論。其基本觀點認為：廠商間不應只有純競爭或純合作，而是競爭與合作同時存在的。事實上，商場必須競爭，但不必置對手於死地。如果相互廝殺最後誰也沒得到好處，這是雙輸 (lose-lose) 模式；同樣的，競合策略認為商場可以合作，但不要忘記爭取自己應得的好處。如果歷經努力，但卻一無所得就成了「輸贏」(lose-win) 模式。基本而言，賽局不同於運動。運動比賽必有輸贏，商場不一定有輸贏，自己成功，別人不一定要失敗。藉助互補者的觀念，亦即當創造價值的時候企業要和顧客、供應商、員工及許多人合作；在爭取價值時，企業則要和上述賽局參

與者競爭。所以商場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過程。而在既競爭又合作的前提下，若能實現「雙贏」(win-win)則最為明智(Brandenburger, Adam M. & Barry J. Nalebuff 著，許恩得譯，2004：9、22)。

基本而言，地方政府爭取利益分配的過程是一個典型的博弈過程。在此種背景下，地方政府對合作的前景事前不明確，它們對競合能夠給自己帶來多大利益的認知，取決於對方的認知和對方可能採取的行動。如果上述博弈過程進展順利，不同政府間的關係就會進一步合作；反之，如果上述博弈過程進展不順利，不同政府的關係就會倒退到純粹的競爭關係，甚至會在產業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等方面形成相互抄襲、惡性競爭，以至兩敗俱傷的局面。競合的博弈過程是走向合作或是競爭，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一)合作能否創造額外價值，預期創造的價值愈高，不同的參與者就愈能夠選擇合作，而不是競爭；(二)參與者之中領導者的行為模式。如果領導者的先發行動不僅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同時也給整個區域帶來整體利益，它的先發行動雖然可能導致其他參與者的直接利益損失，但如果這種先發行動帶來的整體利益能夠給其他參與者形成溢出效應(spill over effect)(即間接利益)，而間接利益又大於其他參與者遭受的直接損失的話，其他參與者會選擇合作的態度接受領導者的行為，而不會採取對

抗性競爭的方式。反之則會導致其他參與者的對抗行爲，以至惡性競爭；(三) 領導者以外的普通參與者的行爲方式。在博弈過程中，爲了增進自己的利益，普通參與者也可以採取先發行爲，這種行爲同樣會給其他參與者（包括領導者）帶來直接的競爭和間接利益，並有可能讓這個普通的先發行爲者成爲新的領導者（參見表四）（朱文暉，2003：73-74）。

表四：地方政府博弈行爲對照表

分析方法	遊戲結構	參與方最高利益	對其他參與方利益的認知	參與者的行爲與利益分配		
				先發行爲者的利益	其他參與者的利益	其他參與者的回應
競爭	零和遊戲	完全不一致	完全不考慮	有所得	有所失	對抗
合作	正和遊戲	完全一致	充分考慮	基於長期互信來分配額外價值		合作
競爭	正和但可變的遊戲	不完全一致	對方認知和行爲的互動	有所得	溢出效應大於直接損失	傾向合作
					溢出效應小於直接損失	傾向競爭

資料來源：朱文暉，2003，《走向競合-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比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73。

肆、市場轉型初期：封閉、競爭遠大於合作

長三角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後，市場轉型主要區分為三大階段：(一)市場轉型初期；(二)市場轉型過渡期；(三)市場轉型深化期，解讀府際與競合關係。

就歷史淵源與脈絡而論，江蘇與上海關係歷來互動不佳。江蘇與浙江往來不多，上海與浙江則處於較佳狀態，主因是上海人脈淵源主體以浙江人為主，寧波人即為主體。此外，就經濟互補與依存而論，浙江工業化水準較低，又曾是對台戰略前線，國家重點投資相對不足，加之浙江溫州、台州人多地少，資源匱乏，只能外出謀生。事實上，浙江、上海互補性強，八〇年代各類票證可通用。因此，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經濟是以依託上海為主。²

就區域經濟整合行政安排而論，八〇年代採取「由上而下」模式。八〇年代初，上海學者呼籲打破地區分割，實行一體化。1983年國務院即成立「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參見表五)，但當時地方政府間意願低落，上海地方首長陳國棟、胡立教即不感興趣，主要是政治因素。因為「文革」後以穩定政局為先。當時的提法是：「上海不當盟主，不為人先。」³事實上，當時各省市各

² 訪談上海地區大陸學者所獲訊息。

³ 同前註。

自有利益考量，不易形成共識。失敗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嘗試、經濟與社會條件不成熟，且沒有共同利益訴求。

表五：長三角「兩省一市」區域整合大事紀

年 別	組 織
1983	國務院組建「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提出以上海為中心建立長三角經濟區，其範圍幾經演變，陸續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五省一市。
1992	連通江蘇與上海的滬寧高速公路建設正式啓動。 「城市經濟協調會」成立，目的是確立轄區間合作夥伴關係，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1992	由上海帶頭成立了長江三角洲經協委（辦）主任聯席會議，以推動區域內城市之間協作。由於經協委（辦）主任聯席會議作用力度有限，之後成立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每二年召開一次會議，各市市長或分管市長、協委（辦）主任出席會議。
1997/4/28	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在江蘇揚州成立，舉行第一次協調會。確定以商貿、旅遊兩個專題為重點，廣泛展開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
2001/5/11-12	第一次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在浙江省召開。會議交流了各地區在「十五」期間的發展計劃，研究探討了三省市加強經濟合作的形式與內容。會議明確，加強三省市的合作是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的客觀需要；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共同構建新的區域優勢；選擇若干重點領域開展交流與合作；確立三省市經濟發展座談會制度。
2002/7/9	杭州、寧波、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六個城市率先展開了區域內證書互認、人才共育的合作。
2003 年初	1. 浙江省委決定，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與交流，並出臺《關於主動接軌上，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合作與交流的若干意見》。 2. 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制度，把共同構建區域大交通、生態環境治理、旅遊客運網絡、資訊資源共用、天然氣管道網絡五大專題，作為合作的重點和基礎。
2003/3/21-22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率團訪問上海，簽署《關於進一步推進滬浙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協議書》，共同探討長三角地區「政府引導、市場驅動、聯動發展」的路子。

2003/4/10	江浙滬三省市的工商部門在杭州簽署合作會議紀要，內容包括：三省市之間企業異地辦廠實行市場准入政策，鼓勵民營企業跨地區投資；在省際間開通著名商標保護「直通車」。
2003/4/15	上海、浙江、江蘇「兩省一市」人行負責調研的官員齊聚陸家嘴召開封閉式會議，共同研討長三角金融合作框架。
2003/5/21	蘇杭甬高速公路江蘇、浙江交界的收費站實現二合一，這是長三角公路運營上第一次打破行政區的藩籬。
2003/7 月底	蘇浙滬三地交通主管部門聚會上海，共同宣佈長三角公路交通網建設實質性啓動，蘇浙滬將共築「三小時都市圈」。爲此，今後五年內，三省市都將投入數百億元的資金，加快省市互通快速通道的建設。
2003/8/15	在南京開幕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四次會議，發表《南京宣言》，以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爲歷史契機，加快長三角聯動和超前發展，向世界級城市群邁進。
2003/9/24	長三角 16 個城市商貿局長聯席會議中，決議將建立一個統一的資訊平臺，納入各城市商貿系統的數據資料等相關資源。
2003/10/13	江、浙、滬三省市簽署教育實質性合作協議，決議推動實現三省市的大學生學分互認、聯合辦學，以及開放畢業生就業市場等，並實施人員資格證書相互認證。
2003 年底	交通方面，長三角都市圈城際公路發展進入介面研究論證的實質性階段；科技方面，浙滬蘇三地簽署的《長三角食用農產品標準化互認（合作）協議》正式生效；文化方面，在上海召開的首次「長江三角洲文化發展論壇」中，建立長三角文化圈合作機制的構想正式被提出。
2004/5/14	長三角地區 16 家城市農行在上海召開首屆合作發展聯席會議，標誌著農行成爲全國第一家建立長三角區域性合作機制的商業銀行。
2004/5/17	長三角地區「兩省四市」貿促機構聯席會議成立，並在滬舉行主題爲「充分發揮區域資源優勢，共創長三角概念展覽品牌」的第一次會議。將利用市場機制推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真正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繁榮。
2004/5/19	長三角十五市的主要領導人齊聚湖州市，共同簽署《共建信用長三角宣言》，爲建立「大長三角，大信用」謀得思想理論上統一。第二屆長三角一體化論壇也「設壇開講」。
2004/9/8	滬蘇浙三省市政府協作部門負責人，以「完善長江三角洲合作機制，務實推進聯動發展」爲主題，交流一年來三省市協作工作，並提出今後一年的共同工作目標和建議。

2004/11/2	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5次會議在上海召開。作為長三角城市間最高「峰會」，本次會議首次建立議事制度，並將城市經濟協調會的常設機構由原來的聯絡處升格為常設辦公室。
2004/12/1	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負責人聯席會議在浙江杭州召開。會議就攜手合作，整合資源，共同打造外宣平臺，展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良好形象，提升本區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進行了探討，簽署《滬蘇浙對外宣傳工作合作協議》。

- 資料來源：1.田伯平，〈長三角區域競爭態勢與江蘇的應對策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4年2月6日。
- 2.高淵，〈從四屆市長峰會看長三角一體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5日。
- 3.〈浙江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跨進新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12月12日。
- 4.鮑洪俊、袁亞平，〈浙江急入長江三角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2月8日。
- 5.沈城，〈長三角都市圈為何畫不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7日。
- 6.〈長三角：不平的平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5日。
- 7.蘇新、達鴻、道傳，〈專家為長三角合作開處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2日。
- 8.康燕、田曉明，〈浙江為何瞄準上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9日。
- 9.高長、曾柏堯，〈大陸長三角經濟區發展力令人關注〉，《台商張老師月刊》，第67期（92年11月15日），頁11-13。
- 10.林華，〈長三角金融聯動猜想〉，《中國外資》，2004年第3期（2004年3月），頁20-22。
- 11.朱文暉，《走向競合一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比較》，頁203-204。
- 12.李芃，〈長三角城市峰會首次建立議事制度〉，<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11月3日。

13.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東方網，〈滬蘇浙共同打造外宣平臺〉（東方網 2004 年 12 月 2 日）；〈長三角「兩省四市」成立貿促聯會〉（東方網 5 月 17 日）；〈長三角 16 家農行結盟〉（東方網 5 月 14 日）；〈共推長三角合作滬蘇浙聯席會議召開〉（東方網 9 月 10 日）；〈長三角十五市共建信用平台〉（東方網 5 月 19 日）。
14. 洪銀興、劉志彪等著，2003，《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機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 33。
15. 上海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98，《上海年鑑---1998》，上海：上海年鑑社，頁 121。
16. 上海年鑑編纂委員會編，2002，《上海年鑑---2002》上海：上海年鑑社，頁 113。

就計劃體制運作與經濟表現而論，當計劃經濟體制仍然佔主導地位，中央政府握有大量計畫分配資源，三地政府競爭主要體現在向中央政府爭取資源。由於經濟關聯度不高，即使蘇、浙將大量工業原料運往上海，主要是計畫分配使然，不算是經濟合作層次。此外，上海在八〇年代仍深受計劃體制侷限，經濟表現亦遠不如江蘇與浙江。1978-1991 年，上海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僅達 7.43%，江蘇與浙江則高達 10.82%與 12.15%（參見表二）。換言之，八〇年代上海仍難以發揮區域經濟龍頭的角色，江蘇與浙江遂多各自發展，與上海整合與互動外溢和擴散效果自不易顯現。明顯的，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中期，長江三角洲之上海經濟領導地位不明確，整個區域合作與分工的溢出效應不大，因而鄰省的江蘇、

浙江爲確保和增進本身的利益，江蘇等地的政府便採取先發行動，以改變博弈過程（朱文暉，2003：74）。

伍、市場轉型過渡期：競爭與合作變遷

八〇年代末期，計劃經濟體制逐步鬆動，資源流動至體制外，但又並未真正進入市場，而是轉移到地方政府。於是各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協作」。當時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設立「經濟協作」機構，其主要職能是：利用本地擁有的資源或商品與外地交換本地急需的資源或商品。如上海以當時緊缺的家用電器換取蘇、浙的棉花、絲綢等。這個階段是三地政府間合作較多的時期，但並非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作，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初期畸形的合作關係。九〇年代後，市場開始發揮分派資源的作用，三地政府間的競爭又扮演主導地位。不過，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原來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資源爲主，後來則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優惠政策爲主，如許多城市爭取建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上海則爭取到浦東優惠政策。此外，部分地方政府甚至還自行制定優惠政策，以吸引更多外國和台、港、澳投資，如蘇州轄下的昆山、

張家港等地即是獲得先發優勢，使得競爭進入白熱化。⁴

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中期以前，由於上海的「龍頭」（領導者）地位未能確立，因而上海、江蘇與浙江在市場變革之府際關係呈現明顯的競爭狀態，而非合作與分工。直至九〇年代中期後，中共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上海深具淵源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與朱鎔基，將區域發展策略重點與資源向上海浦東轉移（江澤民，1992：11-12），因而促成「長三角」經濟快速成長。上海的領導性角色確立，該地區始呈現較良性的競爭與博弈進程，而朝合作的方向運作。換言之，上海在中央的政策奧援與地理和人文條件的優勢下，成為吸引國際資金與資源的平臺與介面，上海作為政策發動者與形成資源集聚優勢，自易促成鄰近江蘇與浙江合作之格局，區域間的競爭開始注重「雙贏」或「多贏」。這種區域間不斷的博弈和「磨合」，有助初步推動區域競爭走向競合。

儘管如此，長三角地理區位與行政體系的特殊性，因而競爭、利益分割與相互制約仍是現實的難題。主要集中在幾個層面：（一）低水平重複建設；（二）行政壁壘森嚴；（三）吸引外資方面競相壓價。事實上，在長三角相距不遠的十五座城市中重點產業發展，有十一座城市選擇汽車零配件製造業，有八座城市選擇石化業，

⁴ 訪問江蘇地區學者與地方官員所獲資訊。

十二座城市選擇通信產業。在城市定位方面，上海堅持由核心圈向外擴張的「攤大餅」戰略，就和江、浙兩省希望體現城市功能差別的要求明顯不協調。重複建設、同質競爭以及城市定位的不協調，反映的仍是行政區劃下不同地方利益的博弈（陳緋雲，2004）。

吸引外資的惡性競爭主要表現在以低價和優惠策略爭奪，府際間並因此結下怨仇與激化矛盾。台灣廣達電腦投資案即為實例。

在昆山，流傳最廣的就是嶼上海對廣達電腦的爭奪戰。當時，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商廣達電腦確定在中國大陸投產，昆山已經和他們談得差不多了，並開始招工。其時昆山已批准了七家筆記本電腦生產廠商，產量達1000萬台，全部形成生產能力的話，僅昆山生產的筆記本電腦就可以佔到全球總量的百分之十幾。可萬萬沒想到上海松江半路殺出，連上海市的書記、市長都出面為松江爭取，終於把廣達電腦拉了過去（〈長三角城市之戰〉，2003/7/30）。

基本而言，九〇年代中期以來，長三角之競合趨勢主要是「由下而上」驅動，中央政府並未進行實質性行政性干預。此一發展態勢，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現實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市場經濟發展與效率提升必然的結果。尤其是「二省一市」首長建立協調聯繫匯報制度即有助化解矛盾、突破瓶頸，並進行整合資源，強化彼此間之良性競爭合作奠定基礎。換言之，一旦上海的龍頭效應與

先發行動持續顯現，且資源外溢效果更顯著，則「兩省一市」趨向競合的態勢將更為明顯（參見表五）。

陸、市場轉型深化期：競合發展趨勢

中國大陸進入 WTO 後，地方政府已不可能再向中央政府爭取更多優惠政策，也無權制訂地方的「土政策」，而地方政府可資利用的要素也將減少。尤其是歷經 2004 年中國實行宏觀調控政策，地方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力，今後勢必進一步削弱。此外，近年成為地方政府介入經濟活動重點的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也將逐漸回收中央管理，以進一步弱化地方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的條件和能力。在此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僅剩下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時，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許較易展開。⁵

中國加入 WTO 後，長三角地區外資爭奪戰仍不可避免。上海市政府 2003 年推出的「173 計畫」即是實例。上海當局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個區 173 平方公里實施的「降低商務成本試點區」計畫，被形象地稱之為「173 計畫」。由於這個「經濟特區」主要是面向世界五百強企業，就直接與江蘇、浙江展開吸引外資的爭

⁵ 訪問江蘇地區學者所獲訊息。

奪。「173 計畫」的推出，被江浙視為上海在世界製造業基地大轉移背景下，圖謀新一輪發展的關鍵步驟。計畫涉及三區的一些地方官員，提出「173，比昆山」的口號。因此，上海週邊的昆山、蘇州、寧波、蕭山等城市，便有如臨大敵之感（李磊，2003）。事實上，這些城市現有的大部份外資，當初即是因為上海的商務成本偏高才外移（〈長三角都市圈為何畫不圓〉，2003/8/7）。

上海 2002 年成功爭取「2010 年世界博覽會」，即具有龍頭示範與資源分享效應，亦是先發行動者取得區域合作與主導權的重要槓桿。換言之，「世博會」衍生之商機與經濟利益外溢效果，例如，旅遊、會展、物流、建築、投資、商貿等一系列相關活動將有利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並成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聚焦長三角〉，2004）。不過，如果「世博會」的利基未能為上海當局所釋放，並與鄰省分享，則易引發府際關係之張力與矛盾。上海舉辦「世博會」前的企業遷移即是實例。

原來上海市 2002 年申博成功後，為建設世博會場館和配套措施，上海需要動遷 4000 多戶企業，這個消息最初令周邊城市大為激動，以為起碼能由此在世博會項目之前分一杯羹，不料上海市卻找各個區縣內部消化了事，一場激動一次希冀完全落空。周邊城市便大大抱怨上海人小氣，並且說，上海人不是要發展高科技嗎？幹什麼還抱著那些傳統產業不放手（劉建峰，2003）。

透過地方領導幹部的互調，亦有助於區域經濟發展趨向「競合」。事實上，長三角「二省一市」的府際競爭關係不僅存在於省與省之間，而是長期深植於省內之地級市與縣市之內。以江蘇具代表性的蘇州與無錫為例，八〇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無錫經濟表現始終領先蘇州，直至 1994 年新加坡設立「蘇州工業園區」始發生改變，外資大幅投資使蘇州於 1997 年經濟表現超過無錫。近年來圍繞外資的爭奪，蘇州與無錫暗中較勁不遺餘力。不過，由於 2004 年 11 月蘇州與無錫官員互換，原蘇州市長楊衛澤調任無錫市委書記，原無錫市委書記王榮周出任蘇州市委書記，此將使得蘇錫間明爭暗鬥的型態趨於緩和。楊衛澤即曾公開表示：「今後要加強蘇州和無錫之間的經濟合作」（周揚，2004）。此外，近期以來，兩地招商活動呈現「相互借力」的作為，無錫招商即強調蘇州的配套條件，蘇州亦援引無錫碩放機場作為交通條件，此皆足以顯示兩地競合的趨勢（周揚，2004）。

長三角地方政治菁英（參見表六）對區域經濟整合之意願，市場經濟發展現實需要，以及競合效應之顯現，將是重要考量因素。儘管區域與城市惡性競爭激烈，但是地方政治菁英的地緣與省籍人脈互動（參見表六），以及近年省級政府與地區政府間的良好發展與競合已次第展開（參見表五）。浙江地區黨政領導人近年

表現尤為積極（康燕、田曉明，2003）。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 2003 年曾表達主動接軌上海的強烈意願。浙江地區之杭州、嘉興、紹興與寧波等縣市亦積極參與上海發展與互動。而產品認證、教育學分相互承認、金融合作，以及市場准入政策，皆是良性競爭與合作的發展。此外，上海、江蘇與浙江自 2001 年起召開「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以建構區域大交通、生態環境治理、旅遊網絡、資訊資源共用、天然氣管道網絡五大議題作為合作重點與基礎（鮑洪俊、袁亞平，2003；龐學傑，2004：121-122），皆有助長三角「二省一市」良性互動與整合（參見表五）。

表六：長三角主要省市領導幹部基本資料

地區	書記	籍貫/出生/政治位階	市長/省長	籍貫/出生/政治位階
上海	陳良宇	浙江寧波/1946 十六屆政治局委員	韓正	浙江慈溪/1954 十六屆中央委員
江蘇	李源潮	江蘇漣水/1950 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	梁保華	江西宜春/1945 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
浙江	習近平	陝西富平/1953 十六屆中央委員	呂祖善	浙江杭州/1946 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

資料來源：中國機構與領導人資料庫，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9684/20021126/874879.html#>。

未來長三角「二省一市」走向競合的誘因與趨勢主要包括：

（一）長三角一體化，以及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建構，促成區域

利益必須透過整合，才能發揮降低交易成本低與合作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二) 珠三角整合框架的形成和運作，將促成長三角整合的壓力，畢竟區域經濟整合與生產力之提升，必須仰賴區域成員協作力量之發揮。因此，珠三角區域整合的成效，將對長三角整合產生互動影響；(三) 2010年「世博會」效應與資源分享，亦有利於強化長三角的良性互動與合作。換言之，「世博會」作為「二省一市」合作與利益分享的平台，皆有助於府際合作條件的創造；(四)「十一五計畫」(中國2006-2010年經濟發展規劃)將針對長三角一體化進行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之規劃和行政協作(〈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調研報告〉，2005：35)；(五) 地方政府績效的評鑑，中央政府不再完全以純經濟增長作為指標，而是以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為訴求重點；地方政府在金融與土地資源的掌控能力弱化，將影響地方政府競爭槓桿與工具的運用。儘管上述政策目標與制約性行為，在短期內不易全面落實，但新政策與作為的實施，將舒緩府際間經濟高成長與競逐外資的惡性競爭，而更多趨向於良性競爭與互惠合作。

柒、評估與展望

中國大陸八〇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二省一市」之府際關係摩擦主要成因，在於競爭的主體並非企業而是政府。換言之，政府角色的「錯位」與「越位」是導致府際關係緊張與經濟發展失序的主因。基本而言，「二省一市」之間競爭多表現為惡性競爭，不僅有市場准入障礙，且市場管理體制亦有不同，加之產業分工不明確與不協調，導致產業結構重疊性高與重複建設之流弊，欠缺市場調節機制之運作。雖然政府間競爭與地方領導政績的訴求造就階段性經濟榮景，但是政府角色的錯亂和干預，亦造成資源分派的扭曲與耗損，這是何以長三角產業同構問題嚴重（徐壽根、陳琪，2004），以及現階段必須落實執行宏觀調控政策，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因。因此，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政府角色的定位與調適，以及企業市場競爭環境之培育，皆將有利於府際關係的協調發展與競合格局的展現。

在中國經濟轉型階段，地方政府經濟自主權與區域經濟運作自主性日益增強，但並不意味中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全面弱化。尤其是中共在組織、人事運作對地方政府仍有絕對的控制權。2004年實行之宏觀調控政策，即對地方政府土地、金融與產業政

策進行直接干預，顯見當前之府際關係呈現地方自主性雖持續提高，但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能力並未實質削弱。因此當前中國大陸是既非中央集權，亦非地方分權，而是兼具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特性之政治體制。此外，府際關係的運作政治領導精英的角色亦是重要環節。畢竟，府際關係的操作無論是政策協調或是決策參與，皆涉及政治菁英人爲因素，尤其是在中國大陸仍體現「以黨領政」特質之體制，表現更爲明顯。換言之，政治信任、政治忠誠、人際互動、政治性格與文化差異，以及經濟結構與實力變化後衍生之政治意識等因素，皆可能影響府際關係與區域競合的發展。

九〇年代以來，由於上海地方首長相繼擔任中央要職，且在浦東開發與長江三角洲發展提供的政策優惠與財政奧援，因而造就上海作爲長江三角洲的龍頭地位與全球化城市。中共領導階層「上海幫」之政策偏好與傾斜顯然產生實質效應。然而，如今中共新領導階層「上海幫」色彩已淡出，中央新政治菁英胡錦濤與溫家寶較傾向於平衡經濟發展策略，於是近年有振興東北與珠三角整合協作之規劃（陳德昇、許光泰主編，2004）。明顯的，中共現階段區域發展策略調整，上海扮演長三角的龍頭角色便會受到挑戰；蘇、浙、滬三省市間之競合態勢亦將產生變化。儘管如此，

隨著中共政治菁英甄補與政治運作日趨制度化，以及地方政治菁英之市場與務實導向和經濟實力提升，區域間「既競爭又合作」態勢仍將是大勢所趨。換言之，惡性競爭的結果只會導致資源分派的扭曲與耗損；良性的公平的競爭與合作則有助效率的改善，以及整體經濟實力之提升。可以預期的是，來自於中央政府對長三角政策性積極奧援，將因平衡發展策略的提出而不復存在，甚而因 2004 年宏觀調控政策，而使長三角快速發展面臨考驗。上海如何在此現實背景下，維繫其領航角色，促成競合態勢良性發展，仍有頗大努力空間。

基本而言，上海仍是長三角的龍頭。例如，跨國公司若在長三角設立地區總部，多數以上海為首選地，較少選擇南京、杭州、蘇州、寧波等地，此是各種現實條件使然。此外，境外投資大體也是以上海為中心，並形成一個向外擴散的梯度結構。但目前上海的龍頭地位仍然不足。浦東開放之初，上海曾提出要建立三個中心，即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後來加上航運中心。客觀而言，目前上海四個中心條件仍有限。以金融中心為例，國有商業銀行總部未從京遷滬，加入 WTO 後金融業開放的過渡期尚未完全結束，金融體制改革仍是最為滯後的領域。上海的龍頭地位不能強化，甚或進一步削弱，顯有較大的負面影響。此外，加

快上海產業轉型亦有必要性。換言之，如果上海不能加速轉型，加快發展金融、物流、研發等服務產業和製造業中的高科技產業，並以此向長三角輻射，則無法與江、浙的產業結構形成明顯的分工，三地的競爭勢必加劇，區域資源更難以整合，恐將會遲滯長三角的可持續發展。

上海與浙江無論是在歷史淵源、人脈互動，或是實質合作皆有明確之作爲與意願。反之，上海與江蘇之競爭張力則較大。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上海與浙江政府間良性競合關係將較早浮現，這顯然與兩省間「競合」能產生與外溢更明確之經濟利益有關。此外，上海與浙江更緊密合作將對江蘇經濟發展產生排擠效應。一方面，上海與浙江是以石化、鋼鐵、汽車與電子爲重點，與江蘇沿江開發策略產業重疊度高；另一方面，上海以整體優勢見長，浙江民營經濟實力雄厚，市場化程度高，江蘇以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運作模式將面臨挑戰（田伯平，2004）。反觀上海與江蘇關係，一旦上海龍頭角色弱化，或是錯失先發優勢，兩省間惡性競爭態勢將不可避免。儘管如此，江蘇地方政府以零地價、低地價與優惠措施吸引外商，並以犧牲國家利益之作爲，在長期之下恐將難以爲繼；素以大陸地區法治嚴謹著稱的上海，亦不致採相應策略進行惡性競爭。因此，以現實利益、市場法則與產業需求爲主導

之相對公平競爭與合作格局，在可預期之未來有可能在長三角地區顯現。

必須指出的是，長三角省級政府間要在短期內消除惡性競爭，以及低水平的重複建設並不現實（王培德，2004）。關鍵仍在於：建立公平競爭與市場遊戲規則，以及必要的中央層級協作機制運作。換言之，長期以來長三角地方政府運作，多以行政干預、政績取向與區域利益為導向（石憶邵，2004：303-304），導致不必要之惡性競爭、市場機能不彰與資源分派扭曲（張帆，2003：2）。因此，如何建構公平開放之競爭規範，強化產業分工與合作機制，以及明確政府職能規範，應是值得重視的課題。中央政府部門固不宜過度干預地方經濟發展，八〇年代「由上而下」的整合即未產生效果，不過在當前中共政治體制下，中央政府在省級府際關係競合運作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劉志忠，2003）。換言之，中央政府如何建立地方政府公平與務實的政績評量標準，避免府際間惡性競爭；在區域經濟發展政策規劃，推動必要的協調與對話；對地方政府犧牲國家利益為手段非法吸引外資之行為，進行必要之管理與監督；建構「由下而上」的區域市場經濟整合機制；推展長三角「二省一市」間行政區域重劃；落實政府職能調整的法制規範，以及營造公平、透明與法治的投資環境，仍有其功能性與

迫切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2004，〈長三角 16 家農行結盟〉，東方網（2004 年 5 月 14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2004，〈長三角「兩省四市」成立貿促聯會〉，東方網（2004 年 5 月 17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2004，〈長三角十五市共建信用平台〉，東方網（2004 年 5 月 19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2004，〈共推長三角合作滬蘇浙聯席會議召開〉，東方網（2004 年 9 月 10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2004，〈滬蘇浙共同打造外宣平臺〉，東方網（2004 年 12 月 2 日）。

《上海經濟年鑑》，2004，上海：上海市年鑑出版社。

上海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98，《上海年鑑---1998》，頁 121，上海：上海年鑑社。

上海年鑑編纂委員會編，2002，《上海年鑑---2002》，頁 113，上海：上海年鑑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中國機構與領導人資料庫，2004，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9684/20021126/874879.html#>（2002年11月26日）。
- 王培德，2004，〈地區經濟競爭整合的尷尬〉，《學習時報》，
www.studytimes.com.cn（2004年3月25日）。
- 石憶邵、王克強，2002，〈長江三角洲地區協調發展的特徵及問題
探討〉，《同濟大學學報》，第13卷第3期，頁49-54。
- 石憶邵，2004，〈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長江流域
資源與環境》，第13卷第4期，頁303-304。
- 田伯平，2004，〈長三角區域競爭態勢與江蘇的對應策略〉，頁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4年2月6日）。
- 江澤民，1992，〈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新華月報》，總576期，頁11-12。
- 江蘇省統計局，2004，《江蘇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朱文暉，2003，《走向競合—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比較》，北
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李 芃，2004，〈長三角城市峰會首次建立議事制度〉，
<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11月03日）。
- 李 磊，2003，〈上海「173計劃」嘗試經濟特區蘇州緊急應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7月31日）。

沈城，2003，〈長三角都市圈為何畫不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

林華，2004〈長三角金融聯動猜想〉，《中國外資》，2004年第3期，頁20-22。

卓永良、孫裕增，2003，〈切實構築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機制—長江三角洲地區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態勢研究〉，2003年第2期，頁181-185。

周業安、馮興元、趙堅毅，2004，〈地方政府競爭與市場秩序的重構〉，《中國社會科學》，總第145期，頁58。

周揚，2004，〈長三角城市明爭暗鬥蘇州無錫走向競合〉，
<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11月17日）。

〈長三角城市之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7月30日）。

〈長三角都市圈為何畫不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7日）。

〈長三角：不平的平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5日）。

〈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調研報告〉，2005，《中共中央黨

校報告選》，第3期，頁35。

洪銀興、劉志彪等著，2003，《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機制》，頁33，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高長、曾柏堯，2003，〈大陸長三角經濟區發展力令人關注〉，《台商張老師月刊》，第67期，頁11-13。

高淵，2003，〈從四屆市長峰會看長三角一體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5日）。

徐壽根、陳琪，2004，〈產業同構：長三角新一輪引資熱之隱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4年10月8日）。

浙江省統計局，2004，《浙江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浙江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跨進新階段〉，200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12月12日）。

康燕、田曉明，2003，〈浙江為何瞄準上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9日）。

張帆，2003，〈長三角城市之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7月30日）。

陳德昇、許光泰主編，2004，《振興東北：政策、機遇與挑戰》，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陳緋雲，2004，〈「泛珠三角」模式對長三角及長江流域經濟發展

- 的啓示》，《長江三角洲城鄉一體化論壇交流材料》（98），頁 7-8。
- 〈聚焦長三角〉，200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4年）。
- 劉石慧、王正衛，2003，〈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發展趨勢研究〉，《財經研究》，第 29 卷第 11 期，頁 48-55
- 劉建鋒，2003，〈長三角引資大戰令上海擔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6月9日）。
- 鮑洪俊、袁亞平，2003，〈浙江急入長江三角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2月8日）。
- 謝慶奎，2000，〈中國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 1 期，頁 26-33。
- 蘇新、達鴻、道傳，2003，〈專家為長三角合作開處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3年8月12日）。
- 龐學傑，2004，〈第三次江蘇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上海經濟年鑑》，頁 121-122，上海：上海市年鑑出版社。
- Brandenburger, Adam M. & Barry J. Nalebuff 著，許恩得譯，2004，〈競合策略〉，頁 9、22，台北：培生教育出版集團。
- Lu, Shu Shin 著，孫彥譯，2004，《索尼之路》，頁 205-21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Breton, Albert. 1996. *Competitive Government: An Economic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in the Yangtze Delta: Co-opetition Tendency

Te-Sheng Che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various economic zone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rapidly growing under the market opening and modernization policies. Among those zones,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have limited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areas are the most outstanding performers regarding GDP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s not without problems and issues. The concerns include intergovernmental interactions, coordination, operation,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They deeply affec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area's growth, and these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s role and behavior as the markets transform. The paper also includes comment on intergovernmental conflicts, integrations, and challenges.

The new central government leadership style of Hu jin-tao and Wen jiao-pao is more inclined to overall, evenly-distribu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Under this policy, there are plans to revitalize China's East-North industrial zones and Zhu River Delta area consolidations. Therefore, Shanghai's role as the center of Yangtze Delta could be challenged. With this background, Shanghai needs to make more effort to positively create a "co-opetitio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ustain its navigator role.

Traditionally, Shanghai and Zhejiang have strong historical ties in emigration, trade, actual cooperation and good will. To the contrary, Shanghai and Jiangsu have had relatively strained relations.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co-opetition" relation could spill over into economic benefit.

The negative,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low level, poor quality, redundant construction among Yangtze Delta provinces should be removed in a short time period. The key solution would be to establish a fair competition system based on market rules and a central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Yangtze Delta, co-opeti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economic transition

